

今冬較暖，但寒流不斷襲來。天氣冷是正常的，而人為製造的寒流，則令人心冷。1月24日，《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因發表了令當局反感的文章，被勒令停刊整頓。「冰點」追求的「民主、法治、思考、自由和權利」等價值，是普世的，也是落實於香港人現實生活中的價值和權利。本刊十五年來並沒有因為發表某篇文章而受到壓力。對照那些堅持理念、有道德感和職業精神的大陸同仁，我們更加珍惜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言論和學術自由。

這正如下面一位老讀者所說，本刊「是內地學者能夠發揮自由思想並能呼吸到境外學術氣息的一個窗口」。我們也希望像裴毅然呼籲的那樣，「關心中國事務的學界同仁」，主動地聯絡我們，貢獻你們對辦好本刊的建議和想法。

寒流總會過去。過兩天就是春節，我們期待着萬象更新的春天來臨。

——編者

一位老讀者的聲音

我也算是《二十一世紀》的老讀者了，1996年第一篇投稿（〈拒絕與接受：沈從文的命運〉）即被選用。90年代前期，由於該刊是國內唯一能夠方便找到的境外刊物，有一點內地讀者渴望的「不同聲音」，並且選稿前衛先鋒，編輯嚴謹，學術氣氛濃郁，保持沉穩理性，故而迅速為寰內學界所關注，尤其為中青年學子重點追蹤。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我覺得《二十一世紀》不僅是內地學者能夠發揮自由思想並能呼吸到境外學術氣息的一個窗口，更深一層的意義還在於引導學人走向理性化，轉衝動的愛國激情為沉穩的理性分析，化簡單的否定為深入的剖因，使國人看到我們走向民主自由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實際牽絆。辛亥前的時代風氣為：「被髮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雖然激蕩風雷鼓舞民氣，但畢竟未能看到革命伴隨的危險及「革命後」的艱難。較之「先破後立」的五四式激情思維，《二十一世紀》所凝含的理性分量遠遠掂手得多。

本期發表拙文〈文革狂瀉中的知識份子〉時，我恰巧訪學香港中文大學，親睹親感該刊的認真負責。責編將全文數十條註釋逐一核對，糾正了粗疏所致的錯訛，令我感動不已。當我再三感謝時，責編真誠表示：「這是我的工作！」劉青峰則說：「還有比我們做得更細更嚴的呢！」

當然，隨着時間的推移，《二十一世紀》所刊文章愈來愈專業化，幾位當家人也承認「尋找公共話題一天比一天困難」。作為老讀者，我還是清晰感受到他們那份嘆息腸內

熱。當然，中文大學領導層，以實際財力長期支撐這一份精英學術文化刊物，可謂具有高瞻遠矚大眼光。至於公共話題，我想在此呼籲：關心中國事務的學界同仁，如有了想法就向編輯部發一封email，熱點也就容易「形成」。比如筆者正在研究的「中國當代知識份子所存在的問題」，似乎就是一個足以容納各種內容的大題目，也有點公共性。

裴毅然 上海

2006.1.24

先治「恐選症」

周其明〈對中國《選舉法》2004年新修改的批評〉（2005年12月號），怎麼看也算是「善意批評」、「建設性批評」。周的批評集中在兩點：一是該改的基本沒改，二是所改者「敷衍塞責」。由選民直接選舉的正式候選人的確定，歷來實行名單提出以後須經「反覆醞釀」、「討論、協商」之法，周文指出它「是選民對選舉意見最大的一個環節，也是最易被暗箱操作或操縱的地方」，可是對它的修改卻是刪去「反覆醞釀」，保留「討論、協商」，真不知改了以後怎樣能夠防止「暗箱操作或操縱」！

正如周其明所指出，現行《選舉法》的根本缺陷，乃在它不能保障公民自由而公平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此對它的所謂修改，應當首在改此根本弊端。我相信歷次負責「修改」選舉法的專家和領導，對此非不懂也，非不能也，是不願也，是不敢也。為何不願？源於不敢；為何不敢？源於害怕。害怕甚麼？害怕選民認真選起來會「失控」。說到底，不過害怕自己信任的人被選掉，自己不放心的人被選上來。

選舉必須認真，和害怕選舉認真，顯然是兩種對立的態度。前者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莊嚴規定，來自中國共產黨建設高度民主社會的承諾；後者的來源不明，但卻分明迭有表現，此次對《選舉法》的「修改」，就是一例。

黃一龍 成都
2006.1.16

歷史深處的沉痛記憶

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有史以來最受人尊敬、最有政治聲望的黨的領導人之一，被譽為「黨的良心」。嚴平的〈懷念胡耀邦——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場爭論〉文章（2005年12月號），以豐富的文獻和對客觀歷史的尊重為依據，披露了中共高層當年關於「精神文明」及「資產階級自由化」爭論的一段鮮為人知的史實。

80年代，關於「精神文明」的爭論也凸顯出來，中共高層出現了以胡耀邦等為代表的開明派力排眾議，堅決主張用「精神文明」而不用「共產主義

精神文明」的提法，並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傳達了自己的幾點理由，但卻遭到了以鄧力群、胡喬木等為代表的「極左」人士強烈反對，並由此引發了一系列路線方針上的爭論。由路線方針上的爭論又間接引發了黨內權力之爭，以至於胡耀邦受到批判、檢討，並被迫辭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

胡耀邦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對自由化思潮的政治包容顯示了其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高度寬容的領袖風範。「自由化思潮」實際上是80年代以後中國官方及民間掀起的一種呼籲政治改革、開放黨禁報禁、實現言論自由、追求憲政民主的社會思潮和政治思潮，它是對國內「極左」思潮和政治保守主義的批判，這不但有利於中國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而且也有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從文章披露的史實中可以看到，胡耀邦當年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峻，並且着手啟動政治改革。遺憾的是，由於「極左」力量的極力反對，政治改革被扼殺在搖籃之中。

朱中原 北京
2006.1.16

互聯網正在改變中國

如果說改革開放至今二十多年來有甚麼事情真正深遠地影響了中國，那麼，當推上個世紀末開始的互聯網的興起。短短十年之間，中國網民的數量，光是官方的統計，就達到一億以上。中國進入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信息時代。

互聯網意味着一種新的交

流方式的誕生，這種交流方式的基本特點是：平等，自由。在某種程度上，互聯網承擔着廣場的功能。在廣場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可以自由地發出，每一個交流群體都靠語言與思想的魅力吸引聽眾。廣場造就了「意見領袖」，甚至可以這樣說，互聯網廣場在中國，已經造就了一群新興的公共知識份子。

胡泳在〈博客在中國〉（2005年12月號）一文中，區分中國的三類博客，第一類是「憤青」博客。「憤青」一詞，在一開始特指「懂得社會的／道德的／文化的義憤、有一定見識的青年，而不是只會發泄情緒的無理取鬧者」。但是一連串的民族主義網絡義憤興起之後，「憤青」一詞的含義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在主要指那些無理性宣泄民族情感的民族主義者了。胡泳指的「憤青」，基本上是思想青年，這些人構成了網絡知識份子的最主要部分。許多紙媒無法發出的聲音，都能夠在他們的個人博客中聽到，他們的言論，佔據着互聯網廣場的一角，構成了真正的「輿論」。

在只有報紙、廣播、電視的時代，只要有足夠的管治，控制輿論還是可能的。到了互聯網時代，對輿論的控制，則不啻於用白紙包住燃燒的火焰。互聯網已經滲透到這個時代的生活裏，它激發的表達欲望、獨立精神，已經滲進每一個網民的神經裏，假以時日，它必定能夠促進一個公民社會的形成。

陳壁生 廣州
2006.1.13